

丁 钢 主编

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C h i n a ' s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
R e v i e w

 教育科学出版社

第 19 辑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丁 钢 主编

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第 19 辑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刘明堂 孔 军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张 珍 金 霞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第 19 辑 / 丁钢主编.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91-0375-0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871 号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第 19 辑)

ZHONGGUO JIAOYU: YANJIU YU PINGLU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167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247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1.75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2 千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学术研究与交流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以教育界为考察中心	(1)
------------------------------------	-------

王东杰

研究报告与评论

中国乡村教育的社会学解释：“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	(38)
-------------------------------------	--------

李 涛

蔡元培：“出山”与“在山”之间 (83)

李春萍

流淌在画布上的绚烂：1910—1940 年代上海美专的女子

肖像 (135)

毛毅静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以教育界为考察中心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Circle

王东杰 (Wang Dongjie)

四川大学历史系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chuan University

内容提要：自一开始，教育界的国语运动便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处在多层次的立体交缠中。它既服务于后者，也是后者的一部分，同时又具体而微地集中展示了后者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国语运动中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追随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民族主义，一是现代主义。作为近代中国御侮救亡的手段，国语运动力图从语言文字方面营建民族国家的疆域，也积极参与了国际文化竞争；对内，国语运动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目标，致力于提升民众的心智素养，也为国民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民族主义外，国语运动还标示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追求“现代性”的一面。

关键词：国语；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现代性

Abstract: There was a multi-level link in the pattern of growth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As part of the latter,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serviced for state-building,

and clearly demonstrated some basic features of it as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we can trace two state-building clues, which were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s a means of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 its survival”,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sought to construct national territory through words and language. Of course, the Movement also took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ulture. At home, the Movement was committed to improve people’s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accomplishment, which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aim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unity, but also was the prerequisite to the people’s liberty fighting. In addition, the Movement also showed that the modernity was Chinese state-building value.

Key words: national language; 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 modernity

1937—1938年，萧乾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梦之谷》。结合作者的成长经历（萧乾，2005：43-46），可以看出这部具有半自传性质的作品，描写了一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北京青年，因为“反教”而被校方开除，流落广东潮州之后的遭遇。身在异乡，这位年轻人的第一个感受是，自己变成了“哑巴”和“聋子”——既听不懂人家的话，也无法让人听懂自己的话。在当地教育界开明人士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成为一名国语教师。虽受到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但总体来说，他的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功。与此同时，他也陷入了一场甜蜜的爱情。但他爱上的这位漂亮女生已经被家长许配给了一个地方军人。结局可想而知，他们的恋爱被粗暴打断，他只有再次出走，国语推广事业也自然中断了。

如果我们把这部完成于抗战烽火中的作品视为一部爱情小说，那么，它的主题——一对纯洁青年男女的爱情，因为“封建势力”的迫害，不得不以悲剧告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丝毫谈不上新鲜。然而，如果换一角度，转从国语运动的视野阅读这篇作品，它就成了

一篇罕见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国语”被赋予了三种不同的作用。首先，它使得情节合理化了。一个北京的失学青年，来到遥远的南国，别无一技之长，似乎也只能以教授国语为生——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稀奇（王东杰，2014a）。就此而言，“国语”虽在这篇小说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其次，它连接起了不同的线索。主人公来到潮州是因为反对培养“奴才”式的教会教育；他离开潮州则是因为自由恋爱，得罪了当地的黑恶势力。“国语”则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系的情节联系到了一起：在第一个情节中，“国语”是相对于外语而言的，代表了作者的民族情感；在第二个情节中，“国语”是相对于地方而言的，代表了作者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而这也使我们注意到了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语”被赋予了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

我们来看主人公如何描述自己初到潮州时的感受：

你知道怎样的残疾人最惨吗？我告诉你，五官中，没有比耳朵和嘴再宝贵的了。没有它们，你的生活里便失去了和别人的接触，你自己也不再能混到同类的生活里去。你看见别人叽里咕噜地动嘴，却摸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也许你自己便是话的主题。你有一腔话要表达，大至你的抱负，小至吃饭、点灯。你干嚷，没人懂你。到那时候，你将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鸚鵡！

然而，你相信吗？如今我便已丢失了这“两宗宝”！多么伤心的事啊！在你眼中，我尽管是同类，而且是同胞；这里，在四周那些奇异目光的注视下，真不知道我究竟成了怎样的古怪东西！（萧乾，1983：43）

由于语言隔阂，虽然同为中国人，却成为不折不扣的异类（“古怪东西”）。无疑，作者想强调的是，国语沟通了国民情意，是国人成为真正“同胞”的条件：“如果国家要走向统一，住在这海棠叶上的各地同胞就必须有共同的语言。”（萧乾，1983：111）

小说里多次使用了“哑巴”“聋子”这样一些与身体残疾有关的比喻，但它们在这里的含义绝不是生理性的，而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同样类型的比喻又出现在主人公面对当地人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没渡过长江时，我一直认为中国瞎子太多了——就是说，文盲太多了。如今，我才知道还有哑巴呢！”（萧乾，1983：62）把文盲称为“瞎子”，是近代以来常见的一个说法^①。事实上，普及文字（扫盲）和推行国语恰好是中国近代国语运动中两个最为核心的课题，而在萧乾笔下，它们也都是使得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乃至精神方面得以“健全”的手段。换言之，只有“混到同类的生活里去”，我们作为一个人才是完整的，否则即是“残废”。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这些言论放到民族国家的理论背景中来理解。

除了国家统一之外，对国语的态度也成为新旧文化之争的一个指标。在主人公的倡导下，由一批“低班的学生”发起，学校里成立了一个推广国语的组织“天籁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一个用赤子之心组成的团体”（萧乾，1983：98）。“低班学生”“赤子之心”这几个字眼都明显指向一种新生的力量。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一批代表了地方意识的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那张天籁团启事贴出去后，有些同学暗地里说起闲话，认为那句“竖起国语统一的纛旗，铲除方言的障碍”，是对本乡人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有人主张另外发一个“方言应铲除，广东话须拥护”的宣言，反对天籁团，反对我们的国语运动。后来这宣言没出成，但我们那张启事却被戳了好几个窟窿。（萧乾，1983：111）

① 比如，1916年12月由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总所出版的《官话注音字母报》第16期登出一幅漫画，其中一位老者哀叹道：“哎呀，我眼睛看不见，一步不能走，可怎么好哇？”一位少年对他说：“先生不要着急，我给你一根马竿。”漫画作者显然熟知“瞎子”“睁眼瞎”一类比喻。

须知，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地方观念常被视为与“国家统一”主张相对立的“封建意识”，而国家统一当然是正当的。考虑到整个 30 年代两广地区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说，反对国语的宣言没出成、倡导国语的启事却被戳了好几个窟窿，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也具有高度写实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反封建”的意义上，“国语”和自由恋爱有了高度的理念契合性：作为新思潮的象征，它们共同成为反动力量打击的对象。

综合来看，《梦之谷》的主人公代表了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的两大诉求。首先，他反对教会教育，积极提倡国语，就对应了民族主义同时要求独立（对外）和统一（对内）的特点。如果我们考虑到萧乾本是蒙古族，这种政治意味就更为深刻。其次，这位年轻人还受到新思潮的鼓舞，勇敢追求个人幸福，体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尽管以悲剧告终）。换言之，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运动理所当然地体现出同样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梦之谷》所描绘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教育界（学校）。主人公在校读书时和同学一起“竖起国语统一的纛旗”，毕业后又担任国语教师，继续从事国语推广，这些都提醒人们，考察国语运动时，应当注意教育界是国语运动最一般的发生空间。不仅如此，《梦之谷》的叙事还透露出一则消息，即教育界人士往往是各地国语运动的主力。总之，教育界乃是国语运动不可或缺的发起与推动力量。与之相对应，相关研究也需引入教育视角。

对于中国 19 世纪晚期以来的国语运动，学界此前已经有过一些讨论，其中也包括笔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那些文章对此运动中的一些重要史实做了重建，并在此基础上，从思想史的立场上对它们做了分析，本文则试图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国语运动做一综合性的论述。作为一篇通论性质的文章，笔者将更多地关注一些理论性的问题。不过，这些思考也绝非单纯的理论性推演，仍建立在基本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为此，笔者必须依赖于过去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

些论述，采取点到为止的方式，以简化自己的论证过程，这是首先需要向读者道歉的。

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对外的层面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看，在每一个层面中，国语都扮演着积极而活跃的角色。具体来说，对外而言，国语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是御侮救亡的手段；其次，它力图从语言文字方面营建民族国家的疆域；最后，它是国际文化竞争的组成部分。对内而言，国语运动的意义体现为：第一，它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目标；第二，它致力于提升民众的心智素养；第三，它是国民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重要指标。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产物，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成立的。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箱”（吉登斯，1998：145）。在这里，“边界”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定义要素。事实上，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中，中国首先是民族主义思潮的追随者、模仿者而非原创者（这并不排除其在追模仿效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发挥），在它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前，就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由列强组织和操控的国际政治权力网络中。这一形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因此，我们对国语运动在民族主义建设中作用的分析，首先从对外的一面开始。

琼·布鲁伊（Jones Breuilly）等人曾指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欧各国，它是对这些国家当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反应，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政治秩序的产生（西蒙·冈恩，2012：150-151）。虽然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形有很大差异，但这一分析对近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中国民族主义同样产生于“合法性危机”的刺激。不同的是，在中国，这种危机特别体现在应对列强入侵的屡次失败中。到了19世纪晚期，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

这些失败在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那里激发起了普遍而巨大的救亡热情，成为民族主义发生与成长的基本动力，导致国人对传统或至少是其中的某些要素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倡导一系列以列强为榜样或参照的改革，国语运动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晚清以来国人对中国面临危机所产生的各种检讨中，有一个意见曾经颇为流行，而今日却少有人关注。这个看法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只是一种症状，其真正的原因是“沟通危机”：由于信息交流渠道存在着严重障碍，下情无法上达，导致了整个共同体的痿痹不仁。康有为 1888 年就警告光绪皇帝说：“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康有为，1998：59）甲午以后，“通”更成为趋新思想家们的关键词，这只要看看谭嗣同的《仁学》，就可得到一个深刻印象。

造成沟通障碍的原因众多，除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外，语言、文字这样一些交流媒介也被视为应承担主要责任的因素之一。在这方面，清末直隶士人马体乾精练地传达了不少人的共识：“我国之大，病在不通。智愚不通，贫富不通，朝野不通，北南不通，古今不通，各省不通。究其极，概以文字不通、语言不通二者为诸不通之源。”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病症，必须从改革语言文字入手，才能“通此诸不通之通弊”（马体乾，1958：86）。这段绕口令式的话，相当传神地表现了时人面对时局压力而产生的紧迫感，以及因为自信掌握了最核心的真理而急于一揽子解决困局的大气魄。这种心态成为贯穿国语运动的一条主线。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份文件还说：中国的国语运动是“国难”的产物，“推行国语教育”乃是“挽救国难最基本而迫切之工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年份不详）。在这种认识下，语言文字的改革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次，国语被视为民族区分的重要标识。这一看法也是从西方传来的。不过，有关语言和民族的关系，西方存在两种看法：一派认为语言与民族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合——语言的转变即是民族的转变，反

之亦然；另一派则认为，语言与民族之间并无必然的亲缘关系。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第一派的看法^①。麦孟华于1900年提出，国家成立的条件包括：国界（“界其国土”）、文化（“厘其风俗”）、语言（“异其语言”）、人民（“萃民人共同之团体”）（伤心人，1900）。三年之后，一篇倾向于革命的文章也指出，中国建设民族主义极具优势，因其“种类”相同、“习俗”相似，“语言虽南北稍别，而操同一之语者有三亿人以上，且文学一致足补其缺”（张枏，王忍之，1960：417）。1905年，汪精卫列出“民族”成立的六个条件，第二条即是“同语言文字”（精卫，1905：2）。这些主张都把语言视为民族成立的要素。1906年，梁启超更引用了“德国人种学大家麦士苗拉（今通译为马克斯·缪勒，笔者注）”的话：“血浓于水，语浓于血”，并据此断言，“以皮肤骨骼辨人种，不如以言语辨人种”（梁启超，1983：2-3）。

不过，麦孟华、汪精卫等人所说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指汉族而言。可是，如果采用这个狭义的“民族”概念，“中国”的组成部分并不单一。梁启超即在前引文中推断：根据中国的语言分布情况可知，“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1983：4）。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另一个“民族”概

① 当然，对此问题，近代中国同样存在不同观点。严复1906年在上海应青年会邀请所做的演讲中就提出，“治民种之学者”所据以区分种族各类标准，“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西人以印度与欧人为同种，即“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之故。然严复对此并不同意，以为“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拿来作为国家成立的条件，盖“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严复，1986a：1246）。事实上，即使同一人的前后主张也有不同的。张君勱曾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一文中指出：欧洲诸国的文字、衣冠、正朔、礼俗，四者皆同，之所以成为不同的民族，乃以血统和历史不同之故（裴自余，2012：94）。由此，文字并不是划分民族的根本因素。但两年之后，他又发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一文，直言民族成立的要素有三：言语、风俗、历史。其中特别强调，“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是造成“休戚相关”感的重要因素（张君勱，2009：209）。

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提出，实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遇到的困境有关。我们知道，“民族国家”的标准定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个定义显然不合适，否则就意味着国家分裂。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概念指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具体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是“中国”的话，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民族”即是“中华民族”——为了区别的方便，我们称之为“国族”（王东杰，2014a）。毋庸置疑，这个概念的提出缓解了中国面临的民族主义理论困境；但在事实上，它又和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恰好相反：不是先有“一个民族”，再有“一个国家”，而是先有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再来据此促进“一个国族”的融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乃是硬性拼凑而成，事实上，它自有其历史性的建构依据和基础）。这一点，证实了布鲁伊的论断，一般来说，“‘民族’是国家的产物”，而不是相反（西蒙·冈恩，2012：151）。

然而，仅有“中华民族”这一个名词，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语言是区分民族的标志的话，中国各民族语言之复杂，适足以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障碍^①。1928年，张之江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议推行国语，理由是，欧美各国无论是“以单纯民族而成为一国者”，抑或“以数种民族而合为一国者”，都会要求语言的一致，“即在异邦属地，亦亟亟提倡其固有之语言文字，不遗余力。故欧美人足迹所至，兼并弱族，固结团体，胥以言语同化为始基。我国号称五族共和，所恃以通情款谋联络者，除政教礼俗而外，国人亦颇知注重国语统一”，然效果不佳，必须加强。（张之江，年份不详：186）1930年，近代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介绍比利时国内“语言战争”的文章，其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存在不在乎她的人民

① 时人王蕴山便曾提出：“世界上有语言不同文字各异而可成为一国，名之曰同胞的，从古至今实在没听说过。”（王蕴山：1921：104）

有面包吃，有酒饮，有空气呼吸，就算了事；并且还需要有土地、风俗、语言、宗教、政治的统一，及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有共同的利益以资维系。背此原则而存在的国家总不免有萧墙之祸，内顾之忧，或者到底不免于崩溃。”作者承认，他写这篇文章，是要“借以警醒国人，俾知日本在蒙满培植教育及传播日语，实足破坏我国的统一”（袁道丰，1930：31-32）。显然，他这里提到组成国家的“几个民族”，当然特别针对“蒙满”而言。因此，无论是狭义的“民族”概念还是广义的“民族”即“国族”概念，语言都往往被视为一个核心的构成因素。

最后，基于人们对语言与国族之间密切对应关系的体认，国语运动也成为国际文化竞争的一部分。要明白这一点，首先应了解现代语言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一样，语言学也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成长起来的，并直接服务于这一目标。如卡洛·安东尼（C. Antoni）所见，在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也成为一门历史科学，因为这涉及民族语言的源头；语法学也变成了历史语法学”（卡洛·安东尼，2010：66）。在中国，这一情形特别地表现在现代语言学家们对汉语的性质及它在世界语言进化史上地位的讨论中（王东杰，2013a）。

根据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语言学家的主流看法，人类语言可以分作孤立语、黏着语和屈折语，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孤立语是最为原始的语言，屈折语最为高级，而汉语就被放入孤立语之列。简单来说，这一看法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思想来源看，它的基本学理依据显然来自社会进化论——这一观念其时正如日中天，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从国际文化-政治格局来看，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明就被看作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持续恶化，西方语言学者对汉语的评价也有意无意地受到这种恶感的影响。尽管这些学者使用了极为专业的学术用语，分析方式似乎也颇为严谨，但在证据乃至逻辑链条上都存在着关键的裂缝，需要用“理论”加以填补——这给各种文化

和社会的偏见提供了运作空间，而汉语的原始性也正是这些“理论”的产物。换言之，这一结论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判断语言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更重要的，它也受制于语言学家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

这个结论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一般来说，在 20 世纪上半期，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多少接受了西人为中国文化指派的“落后”乃至“野蛮”的地位。但这种接受也是有限度的：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事，只要奋起直追，中国完全可以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换言之，在中国人所接受的排行榜中，中国实际被放在一个可前可后（而稍靠前）的中间位置（王东杰，2007：318-323）。把汉语视为最原始的语言，当然无法使中国人接受。为此，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语言学家们极力推翻西人定案。他们一方面强调，汉语绝非孤立语；另一方面，又采用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仍然来自西方），把语言分为综合语和分析语，其中分析语较综合语更为进步，而汉语正好符合分析语的特征。这样一来，汉语就一下子从最为原始落后的语言，变为最为先进的语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们的目标理解成为汉语洗冤，或把西人成说颠倒过来，而应该看到，他们所描绘的世界语言地图中，实际隐含着另一种（与进化论多多少少有些矛盾的）“国际观”：每一个国家皆能独立自主，而又平等相待。

综合上述三方面来看，“国语”被认为与民族国家的疆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它从语言的角度标示出国家的边界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国家的“语言领土”。因此，它也被视为国力强弱的一个指标。191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挽近灭人之国，必更渐灭其国语，至国语亡而后其国为真亡。”这里前两句已是清末以来的常谈，最后一句则不常见。其将国语直接提升为国家存亡的判断标准，虽不无夸张成分，却也将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展示得更加鲜明。更进一步，作者还断言：“一国愈兴盛，其国语之势力亦愈膨大。”这是因

为，国语所系，与政治、商业、学术无不相关（蛰庵，1918）。这样，语言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二、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对内的层面

对内部而言，国语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国家统一。从清末民初以来，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中国方言众多，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隔阂，国家意识和爱国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1884年，德人花之安（Ernest Faber）在《自西徂东》一书中说：“今之中国，即云、贵、闽、浙等方言，十八省亦如十八国”，以致感孚不易，民情不通（花之安，2001：167）。国语统一运动兴起后，“十八省如十八国”一句被人广泛传颂。1904年，陈独秀化名“三爱”宣传国语的重要，就说：“十八省的人，十八样话。一省里各州县的说，又是各不相同。若是再不重国语，还成个什么国度呢？”（三爱，1904）1907年，有人在一份教会杂志上云：“外人谓我中国无国语”，方言之多，犹“一邦自分数十国”，引为深耻（杨邦超，1907）。语言的纷歧，关系到能否自成一国，作者们的焦虑和诉求都跃然纸上。在这种思路下，国语成为一道桥梁，将每个国民的心灵团结在一起，制造了一种休戚与共的感受。

近代中国人不仅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政治、经济生活的共同体，更重要的，也把她视作一个心灵的、情感的共同体。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最近提出，“民族”的成立主要“基于感情这一维度”，这种感情“与家庭和部族共同体中的爱不同，毋宁说是在脱离了此种关系的人们中间产生的新的连带感情”。也就是说，它“植根于和商品经济不同类型的交换”之上。柄谷甚至据此断言：“所谓民族，正是因商品交换经济而被解体的共同体在‘想象上’的恢复”（柄谷行人，2012：189-193）。民族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可能